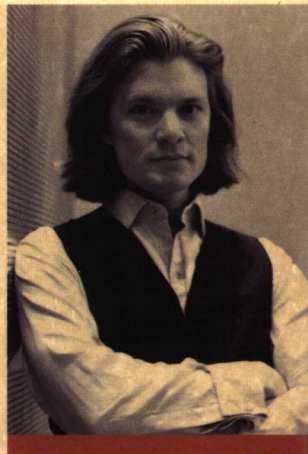




# 为全球化申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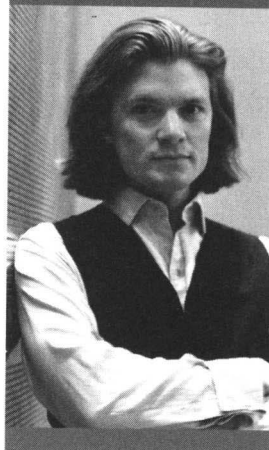
[瑞典] 约翰·诺尔贝格 (Johan Norberg) 著

## In Defense of Global Capitalism



《为全球化申辩》自2001年初版以来，已在20多个国家出版。  
为全球化身边的全球畅销书。

全球化译丛



# In Defense of Global Capitalism

## 为全球化申辩

[瑞典] 约翰·诺尔贝格 (Johan Norberg) 著  
姚中秋 陈海威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2001 Johan Norberg and Timbro/SFN

[www.timbro.com](http://www.timbro.com)

[www.johannorberg.net](http://www.johannorberg.net)

---

Johan Norberg and Timbro/SFN 授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中文版。本书根据 Cato Institute 的英文版译出。

First published 2001 in Swedish with the title *Till världskapitalismens försvar*, and in the American language by Cato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with the title *In Defense of Global Capitalism*.

本书在版权安排、翻译等方面得到下列机构的支持与合作：



[www.tiandaoen.org](http://www.tiandaoen.org)



[www.cato.org](http://www.cato.org)



[www.jiuding.org](http://www.jiuding.org)

## 《全球化译丛》总序

1998年我主编了国内第一套《全球化论丛》，距今已经十年整。这十年是中国与世界天翻地覆的十年，而促使这种巨大变迁的根本动因之一，便是全球化。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全球化实际上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我们这一时代的最重要特征。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普遍关注，全球化研究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热点领域。在推动国内学术界的全球化研究方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功勋卓著。在过去的十年中，社科文献出版社既译介了大量国外学者的全球化研究文献，又出版了众多中国学者的全球化专著论文。经过不懈的努力，社科文献的“全球化”系列，不仅形成为该社的一个品牌产品，也成为中国学界全球化研究水准的一杆标尺。

出版社决定进一步整合旗下的各种全球化翻译作品，推出新的《全球化译丛》，谢寿光社长又嘱我再为译丛做一个总的序言。作为国内倡导全球化研究的始作俑者之一，我责无旁贷。其实，我已经为各种全球化译丛或论丛写过好几篇序言。适应当时国内全球化研究现状的需要，在那些序言中我反复表达的意思是：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是一个人类历史的转变过程，其基本特征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既不是“西方化”，更不是“美国化”和“资本主义化”，它是一种客观的世界历史进程。不管人们承认与否，喜欢与否，害怕与否，它必将深刻地影响中国与

世界的命运。唯有深入研究全球化的规律，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才能在理论与实践上掌握全球化的主动权。现在，上述这些观点几成共识，无须再强调。尤其在实践层面上，中国不仅深度介入全球化进程，而且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全球化赢家之一。

那么，在这里再说点什么呢？我想说的是，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交换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对民族文化造成深刻的冲击。换言之，全球化不仅是一种经济和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文化和学术现象，正在重塑我们的民族文化和学术研究，改变我们的思维所赖以参照的坐标系，要求我们同时具有民族性和全球性的双向思维。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发展起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学术，并使之走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的魅力和实力。

长期以来，建立在领土疆界之上的民族国家一直是我们进行想象和分析的基本依托和主要坐标，全球化的进程正在无情地撼动民族国家的传统疆域。毫无疑问，在可见的将来，民族国家仍将是政治生活的核心，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仍将是基本的政治身份标识。但是，必须清楚地看到，传统的民族国家已经受到全球化的严重挑战。全球化是一种穿越国界的过程，全球性是人类对民族性的一种超越。它既要求我们进行民族的思考，也要求我们学会全球的分析。民族国家仍然是我们进行比较分析的主要坐标，但全球社会也同样应当是比较研究的基本参照。

因此，在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方面，我们必须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既使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扎根于我国特殊的土壤中，同时又不背离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和普遍原理。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根据我国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环境，研究我国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有中国特色，这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人文社会科学必然具有超越国家的普遍性原理，离开这些原理，就无所谓科学。我们的学术研究应当在立

足中国的基础上走向国际化，应当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成为国际人文社会科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使全世界的学者都认识到，中国的学术智慧是全人类学术智慧的重要内容。

全球化要求我们特别重视前瞻性思维和理论创新。习惯于背逆性思维，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言必称三王，行必提尧舜，理想的时代必定在古代。即使欲对传统有所突破，也要“托古改制”。带着沉重的怀古情节来观察和评判现实，一看到或听到新的观点和理论，往往不是冷静地分析，而是根据既定的标准进行指摘和抵触，这是我们的传统思维定式。全球化是现代的延伸，是对传统的超越，无情地摧毁了过去的各种理想模式。在全球化时代，过去的和现存的每一种社会生活模式都暴露出其固有的缺点。它迫使人们进行前瞻性的思考，把理想模式建立在未来，而不再是过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理论的创新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创新不仅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文化进步的动力。

全球化要求我们在进行纵向思维的同时，特别重视横向的比较思维。纵向思维使我们能够学习历史的经验，但片面的纵向思维容易把自己局限于狭隘的历史经验中，总是拿自己过去的经验与现实进行比较，觉得自己现在是如何之好或如何之坏，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对现实的虚假满足或极度憎恶，不是夜郎自大，就是自暴自弃。前者使人看不到自己与别人事实上存在的差距，后者则使人看不到自己身上具有的优势和长处。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的跨国性，它迫使人们更多地进行横向思维，即跳出自己狭隘的历史经验，将自己的经验与别人的经验加以比较，虚心向其他先进者学习，扬己之长，避己之短，既不夜郎自大，沾沾于自己取得的成就；又不妄自菲薄，看到与先进者的差距就垂头丧气。

全球化要求我们打破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进行综合的思考。简单的两分法思维方式长期影响着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其特征是把两种事物截然对立起来，似乎有你无我，有我无他。首先不问观点是否正确，事物本身是否对人民有益，而是一上来就问姓

“资”还是姓“社”，姓“中”还是姓“西”，是“马”还是“非马”。全球化既不是单纯的同质化，也不是简单的碎裂化，它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它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既是普遍化，又是特殊化；既是民族化，又是世界化；既是分散，又是整合。全球化是一种真正的“对立统一”，两种完全相反的趋势却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取其任何一方而忽视另一方，既不符合全球化的客观进程，更会给现实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全球化正在摧毁目的论和宿命论的现实基础，要求我们具有过程性的思维。一切宗教和神学的哲学基础都是目的论和宿命论，它有意识地或潜意识地假定一切事物、一切行动都有其终极目的，人们无法超越预先设定的最终目的。一切封建迷信和个人崇拜归根结蒂也是由这种宿命论和目的论派生出来的，它的现实基础就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观念在封闭的环境中长时期地静止不变。全球化使得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不能再闭关自守，而必须对外部世界开放，否则就是自取灭亡。全球化不是一种目标，甚至也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而是一个过程。它迫使民族国家不断对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进行创新，使改革和创新也变成一个持续的过程。

总之，全球化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生活，正在改变着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全球化将现代文明提升为全球性的抽象，而不管这种文明源于东方还是西方，所以，学习现代的西方文明并不等于“西方化”，正如学习现代的东方文明不等于“东方化”一样。我们正在全力振兴中华文化，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复兴。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迎接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更加积极地进行文化创新，更加充分地吸取人类文明一切合理的成果。这是推动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创造性地向前发展，保持和发扬自己的本土优势和民族特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选择。

俞可平

2008年劳动节于京郊方圆阁

## 前 言

---

我们无政府主义派在学校的选举中获胜了！

那是1988年秋季学期，我们16岁，学校位于斯德哥尔摩西郊。跟以往的选举年一样，学校也举办了由学生们参与的“校园选举”。但我跟自己最好的朋友马尔库斯并不相信这套选举制度。在我们看来，多数获胜的选举规则，就好比是由两只狼和一只羊在竞选应当由谁来充当晚餐。学校想要我们选出某个人来统治我们，但我们所追求的是自己治理自己的生活。

我想，之所以有这种看法，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感觉跟别人不大一样。我们沉迷于电子音乐和哥特朋克摇滚，总是一身黑色行头，头发向后披着。我们只想演奏音乐，读读书，而其他人则似乎热衷于拥有右派的装饰品，将其戴在身上。在我们看来，右翼是上层既得利益者，死硬地抵制一切跟他们不同的东西。但我们对左翼也没有好感，在我们看来，左翼就意味着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和军事化的控制。尽管我们喜欢听仁慈姐妹乐队<sup>①</sup>和瑞典的朋克歌手特斯罗姆（Thåström），但我们真正相信的，则是约翰·列侬那样“幻想一个没有国家的世界”。应当消灭国家，应当让人们在全世界自由地流动，应当让全世界的人们根据自己的意志自愿合作。我们想要一个

---

① 仁慈姐妹乐队（The Sisters of Mercy），20世纪80年代的哥特音乐流行乐队，由几名爱好中古世纪音乐的男子组成。



没有强制也没有统治者的世界。显然，我们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既不是保守党人也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

于是，我们成立了“无政府主义阵线”，填写了一张内容激进、不乏幽默的登记表，成为校园选举的候选人。随即，我们在学校的墙上贴出手写的标语，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谁来管你的生活——你自己还是 349 名宪法兵？”我们要求废除政府……废除校园内禁骑自行车的禁令。大多数老师对我们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认为我们是在给竞选添乱，而我们则觉得，我们是以民主的方式传播我们的看法。校长将我们叫到办公室中训话，但这却反而强化了我们的反抗精神。

我们在激烈的大选中做得很好，获得了 25% 的支持票。社会民主党以 19% 名列第二。我们很兴奋，我们确信，这可能是某种大事业的开端……

这都是 15 年前的旧事了。这么多年以后，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我已经认识到，关于个人、社会和自由的问题，要比我想象的复杂。用极端的乌托邦冲动来解决一切事情，会带来太多的复杂情况和问题。我已经认识到，我们需要政府来保护自由，防止权贵压迫个人。我现在相信，对于保护个人权利这个目的而言，代议民主制度要优越于其他一切制度。我现在认识到，我从前所提防的现代工业社会，事实上让人们享有了此前意想不到的生活水平，给了人们以广泛的自由。但我对自由的基本追求仍跟 1988 年那场精彩的学校选举时一样强烈。我希望人们获得自由，人不再压迫人，我仍然向往一个没有政府使用关税和边界限制人们出入境的世界。

我喜欢“全球化”，尽管这个词相当无趣，但通过全球化，人员、信息、贸易、投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越来越多地冲破国家的边界。这种国际化使我们更少受地图绘制者画出的界限的约束。

政治权力一向是地理的产物，以对某一疆域的实际控制为基础。全球化则使我们能够通过人员的旅行、跨国贸易和投资，更方便地在这些疆域之间穿梭。由于交通成本的不断下降，由于我们获得了更新更有效的通信手段，由于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我们

的选择和机会随之不断增加。

本地的大公司不再是我们购物时唯一的选择了，如今有了外国竞争者。我们也不用待在村里听命于那个唯一的雇主，而可以到外地去寻找机会。我们也不必一切都依着陈规旧俗来，如今，世界的文化都可以供我们选择。我们不必把一生都耗在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到处旅行，不断搬家。

这些因素也导致了思想的解放。我们不用非得遵循当地的习俗，我们希望更主动地、自由地进行选择。公司、政客和各种社团则不得不竭尽所能唤起人们对它们的兴趣，或争取人们的支持，因为人们已经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选择。我们控制自己生活的能力正在增长，社会也由此不断趋向繁荣。

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当那些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士投入到反对全球化的斗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很可怜：他们竟然不是在支持它，而是在反对它！2001年6月份，我去了一趟哥特堡，那里正在召开欧盟首脑会议。我到那儿是想向人们解释，欧盟的问题就在于它正在许多方面抵制着全球化和自由化，我也想在那里提出我自己的观点：应当开放边界，取消控制措施。

我没有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因为我本来准备发言的地方，成了一场战斗的中心。在那里，反全球化的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正在打砸商店，向那些保护民主集会的警察投掷石块。这些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要求的其实是禁令和控制，并向那些坚持不同价值观的人投掷石块。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政府应当重新约束人民，约束那些刚刚才摆脱边界线约束的人民。这么一来，他们就肆意地歪曲了自由的理念。在我们这些当年生气勃勃的无政府主义人士看来，这群人跟无政府主义根本就不搭边。要是用我们十几岁时比较简单直接的话来说，他们简直就是法西斯党人。

不过，这种暴力活动只是更为广泛反对全球化进程的思想运动中的一部分而已。在过去几年间，越来越多的人在抱怨，新的自由化和国际化走得太远了，正在导致某种“极端资本主义”

(hypercapitalism)。抗议这种日益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的运动，或许可以自称为激进主义者，也可以自我标榜为一种激动人心的新观点。然而，它其实不过是对以前的反对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陈词滥调的重复而已，而在以往，这些论调倒是经常被统治者们挂在嘴边。很多集团——第三世界那些实行独裁统治的政权、欧共体的官僚们（Eurocrats）、农业保护运动组织、垄断企业、保守派知识分子和新左派运动，都在担心实现了全球化的人类将以牺牲国家机构为代价而获得更多权力。所有这些团体都一致地将全球化视为一头完全失去控制的巨兽，一头需要圈起来、予以约束的巨兽。

批评全球化的很多观点，都将全球化描述为某种巨大而具有威胁性的东西。这些批评通常不进行理性的思考，而只是简单地描述目前事实。比如，批评者们可以说，全世界最大的第 51 个经济体是某个公司，或每天金融市场上有 1.5 万亿美元资金在流动，仿佛规模本身就内在是危险的、可怕的。但这只是算术，而不是论点。大企业或很高的资金周转量本身就是问题吗？这是有待证明的。而批评者们却通常忘了进行证明。本书将证明相反的观点：只要我们可以自由地挑选和选择，某种自愿合作的形态由于获得成功而越来越庞大本身并没有错。

如此庞大的数字和抽象的词语“全球化”——该词汇形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但直到 80 年代才被广泛使用——带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这是一股匿名的、神秘的、难以表述的力量。仅仅因为全球化是由分散在不同国家的人们的个人行动所推动，而不是由某个集中控制室所主宰，它就被看做是不受约束的、混乱的东西。政治理论家本雅明·巴伯曾悲叹，显然缺乏一种“强劲的力量来抗衡、制服和驯化无政府的全球经济势力”<sup>①</sup>，这反映了很多具有类似心态的知识分子的想法。

---

<sup>①</sup> Benjamin R. Barber, “Globalizing Democracy,” *The American Prospect* 11, no. 20, September 11, 2000, p. 16.

面对全球化，很多人觉得无力。这种感觉的出现并不难理解，全球化进程其实是数以百万计人的分散决策共同推动的，单一的个人与之相比自然是渺小的。对于成千上万人自主安排的生活，我们确实无权干涉，这似乎很让人无助。但反过来，别人也同样无法干涉我们的生活，我们也由此获得了对于自己生活的新权力。因此，这种无力感其实是一件好事情。没有人在驾驶座上，因为我们都是驾驶者。

如果我们不是每天都用互联网收发电子邮件、订购书籍、下载音乐，这个全球性的电脑网络就会萎缩、死亡。假如我们不想购买外国的东西，也就不会有公司会从外国进口东西；如果不是外国的企业家想扩展生意或开办新企业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那也就不会有人到外国去投资。全球化就是由我们的日常活动构成的。我们吃的是来自厄瓜多尔的香蕉，喝的是法国葡萄酒，从英国订购书籍，为那些向德国和俄罗斯出口商品的公司工作，到泰国休假，节约下来的退休金则由基金投资到南美和亚洲。资本可以通过金融企业流动，商品可以由商业企业进出口，但资金和商品之所以如此流动，仅仅因为我们需要它们这样流动。全球化是自下而上形成的，尽管政客们用形形色色的机构（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来管理它，试图控制这个过程。

当然，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对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习惯于把任何事情都置于控制之下。在讨论19世纪瑞典诗人和历史学家恩里克·古斯塔夫·格杰尔（Erik Gustaf Geijer）的一本书中，安德尔斯·恩马克（Anders Ehnmark）几乎是用非常羡慕的笔触写道，格杰尔有这样一种能耐，坐在乌普萨拉，仅靠阅读《爱丁堡评论》和《评论季刊》，他就可以洞悉天下大势<sup>①</sup>。因此，假如由欧洲各国首都的一小撮精英来左右世界历

---

<sup>①</sup> Anders Ehnmark, *Minnets hemlighet: en bok om Erik Gustaf Geijer* (Stockholm: Norstedts, 1999), p. 60.

史进程，那这个世界确实将会非常简单易懂。而现在，其他大陆已经觉醒，社会的发展也开始受到普通人日常决策的影响，于是，一切都变得复杂而让人困扰了。因此，毫不奇怪，有影响力的人士、决策者和政客都宣称，“我们”（其实是指他们）由于全球化而丧失了权力。而事实上，他们的一些权力也确实到了我们——普通人——手中。

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全球性阔佬，但不用如此我们也能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尤其是穷人和无权者将会发现，由于廉价商品不再被关税壁垒拒之门外，由于外商投资提供了就业机会、实现了生产现代化，他们的福利能得到极大改进。即使那些仍然生活在出生之地的人们，也能从信息的跨国流动和选举其政治代表的自由中获得巨大收益。而这则需要更多的民主改革和经济自由。

要求得到更多挑选和选择的自由，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对于生活在富裕国家的我们来说，获得外国产品和服务，似乎是一种奢侈享受，甚至是一种烦恼。可以想象人们是如何看待星巴克或垃圾般的美国真人秀电视节目的，但它们并非完全不能容忍。而对于穷人来说，生存就意味着赤贫、肮脏、无知和无权；意味着总是要琢磨下一顿饭从哪儿来；意味着要走几里地去弄水，即使那水并不适合饮用。

当全球化敲响印度塞加尼村庄的“贱民”老农布哈甘特家的大门之后，他家的房屋从土筑的变成砖砌的，家人前所未有地穿上了鞋子，干净的衣服取代了破烂发臭的衣衫。而在他家门外，往昔污水横流的街道排干了水，犁过的土地的芳香取代了垃圾的臭味。要知道，在30年前，布哈甘特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叫做印度的国家。而如今，他可以通过电视看到世界新闻了<sup>①</sup>。

新的选择自由意味着，人们不再只是给村里唯一的雇主也就是

---

<sup>①</sup> Lasse Berg and Stig T. Karlsson, *I Asiens tid: Indien, Kina, Japan 1966 - 1999* (Stockholm: Ordfront, 2000), chap. 1.

那些有权势的大农场主干活。妇女们离家出外工作，并因此提高了她们在家里的地位。而新生的金融市场则意味着，布哈甘特的孩子们再也不用被迫借高利贷了。在以往，借了高利贷的后果常常是被迫充当放贷者的廉价劳工，而如今，随着人们可以自由地在不同的银行贷到钱，高利贷销声匿迹了。

布哈甘特那一代，人人都是文盲。到了他的儿子辈，也只有少数孩子能够上学；而到了他的孙子辈，每个孩子都能上学了。布哈甘特发现，社会真的变了。社会越来越自由和繁荣。今天，孩子们的行为倒是个大问题。布哈甘特年轻的时候，孩子很听话，在家里帮工。现在，他们变得那么独立，自己给自己挣钱。这样的事情当然会带来冲突，但跟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或者不得不把孩子卖给放高利贷者相比，完全不是一种性质。

你、我这些生活在西方特权世界中的人对于全球化的紧迫问题所采取的立场，能够决定，是让更多人分享到布哈甘特的村庄所出现的那种发展成就，还是让这种发展逆转。

全球化的批评者经常竭力描述这样一幅图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sup>①</sup>）的市场掠夺者已经密谋把资本主义变成世界的主宰者。举例来说，我们看到，政治理论家约翰·格雷将自由市场政策的传播描述为一些试图“渗透到”政府中的“激进”空想家所导演的一场虚拟政变。按照格雷的说法，“这场革命的目标是使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不受政治生活中的民主责任制的制约”<sup>②</sup>。还有些学究——包括《美国前景》的总编辑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和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甚至

① 我用欧洲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一词指信奉19世纪自由主义传统的那些人，他们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即经济和公民自由权利，而不是指更常见的美国意义上的、政治上的中左派。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可能接近于我们所说的“自由主义者”。——作者自注

② John Gray, *False Dawn: 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pp. 39-43.

将鼓吹自由市场的人士形容为某种准宗教派别，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

然而，放松管制、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并不是由极端自由主义的空想家发明出来的。确实有一些政治领导人，比如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受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启发。但最大的改革者其实是中国和前苏联的共产党人，是拉美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和亚洲的民族主义者。在很多欧洲国家，这方面的进展则出自社会民主党人之手。总之，极端自由主义者通过休克疗法进行革命的阴谋论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相反，改革往往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通常是反自由主义的政治家认识到了，他们的政府在全面控制的方向上走得太远了，他们仅仅是基于这一理由，才开始放开本国经济，而不是根据什么自由主义的理论。自由资本主义支配世界的说法，经不住下面的观察结果的验证：今天，我们可能拥有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共部门和最高的税率。已经采取的种种自由化措施，不过废除了过去一些过分的集中控制措施而已，但这些措施还远不足以建立一个自由放任的制度。统治者基于自己的利益、按照自己的速度从过度控制往后退，因此，我们有理由问，这种后退是否真的在自由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还是相反，它其实根本没有做到位。

我说我要捍卫资本主义，指的其实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自由，即那种可以自由尝试，而无须首先请求统治者和边境官员的许可的自由。这样的自由，就是我当初以为通过无政府可以实现的自由。当然，这种自由应当在法律的控制之下，以便确保一个人的自由不至于侵犯另一个人的自由。我向往每个人都能享有这样的自由。假如资本主义的批评者觉得，这样的自由今天已经过剩了，那我就希望让全世界的穷人也能得到这样的自由，哪怕是过剩也行。因为，一直到今天，他们对于自己的工作 and 消费还是只有很少发言权。因此，我毫不迟疑地把这本书的标题定为《为全球资本主义辩护》，尽管我所说的“资本主义”可能更多地是一种未来的可能，而不是现存的体制。

我用资本主义一词，不是特指由资本所有权和投资机会所构成的经济体制。这些东西也可以存在于命令式经济中。我所指的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可以进行自由竞争，它的基础则是使用自己的财产的权利和讨价还价的自由、签订契约的自由、开办企业的自由。因而，我所捍卫的，其实就是个人在经济事务中的自由。资本家如果不是通过竞争来获取利润，而是跟政府沆瀣一气，那就是一股危险的力量。假如国家实行独裁统治，公司就很容易成为侵犯人权的帮凶，不少西方石油公司在非洲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sup>①</sup>。基于同样的理由，假如资本家活跃于政治权力的走廊上寻求利润和特权，那他也就不是真正的资本家。相反，他们将威胁到自由市场，因而，必须对他们予以批评和抵制。商人通常都想玩政治，政客也想当商人。这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一种混合经济，在这里，企业家和政客混淆了自己的角色。只有当政客追求自由主义政策，而资本主义专心做生意，此时，才有自由资本主义。

因此，我信仰的不是资本主义或全球化，也不是种种体制和管制性法规，尽管它们让我们取得了繁荣、创新、交流、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成就。这些东西都是人为创造出来的。我信仰的是人们实现伟大目标的能力，及源于我们的互动和交换的联合性力量。我之所以期望更大的自由和更开放的世界，不是因为我相信一种体制凑巧比另一种体制更有效率，而是因为，这些东西提供了一个释放出个人创造性的框架，而别的体制却做不到这一点。它们刺激了人的能动性，从而带来了人自身、经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相信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信仰经济增长、信仰经济本身或效率。它们尽管也是可欲的，但仅仅是结果而已。相信资本主义的核心则是相信人类。

跟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一样，我也可以认同法国社会党总理若斯

---

<sup>①</sup> 比如，参见 Human Rights Watch, *The Price of Oil: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Nigeria's Oil Producing Communities*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1999), <http://www.hrw.org/reports/1999/nigeria/index.htm>.



潘的一句话：我们只要一个“市场的经济，而不要一个市场的社会”。我的结论不是经济交易可以取代人类的一切关系。我所追求的是各个领域中的自由和自愿性关系。在文化领域中，这意味着表达和出版自由；在政治领域中，这意味着民主制度和法治；在社会领域中，这意味着根据自己的价值生活和选择自己的同伴的自由；而在经济中，则意味着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

我的意图并不是主张我们应当给所有东西都标上价格。生活中重要的东西，比如爱情、家庭、友谊、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它们不可能用金钱来标价。有些人相信，自由主义者以为人们总是根据其收入最大化目标采取行动，这样的人其实对自由主义者一无所知；而任何确实这样思考问题的自由主义者，可谓对人性毫无所知。我写作这本讨论全球化的价值的书，而不是去当会计师或渔民，驱使我这样做的，并不是想追求更高收入。我只是写下了我信仰的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很要紧的。我之所以希望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是因为，这样的社会能给人机会以选择什么对他们是最要紧的权利。

最后，我要对那些帮助我整理我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考的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而由于很简单的理由，这一主题对他们也很重要，尤其是对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森（Fredrik Erixon）、索非亚·勒布兰德（Sofia Nerbrand）、莫里西奥·罗加斯（Mauricio Rojas）。我也非常感谢巴布罗·本特森（Barbro Bengtson）、夏洛特·哈格布拉德（Charlotte Häggblad）、克里斯提娜·范·乌格（Kristina von Unge），他们以很高的效率使我的手稿变得干净利落。

约翰·诺尔贝格

斯德哥尔摩，2003年1月